

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

傳統——

現代人的兩刃劍

鄭曉江 著



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

傳統

現代人的兩刃劍

鄭曉江 著

传统——现代人的两刃剑

目录

引言：蓦然回首

一个热点的兴起	1
环球注视着中国	6
严重的分歧	13
历史将如何落笔?	15

文化选择的“困境”

第一次“大碰撞”：中学与 佛学	20
第二次“大碰撞”：中学与 西学	25
第三次“大碰撞”：中国 文化与 西方文化	33
文化发展轨迹的反思	47

选择新视野

我们接受“接受学”吗？	55
价值观与多重思考模式	71
文化认同中的系统论观念	77

传统价值观的超越

“维纳斯”为何遭白眼？	83
传统价值观笼罩下的中国	86
也许该这样抉择	94

传统道德观的现代照察

传统道德的三大特征	103
传统道德的理论透视	109
“泛道德主义”的破产	116

传统政治思想的反思

“民本主义”面面观	122
治国之道的再探讨	128
突破“孝道”的怪圈	132

传统思考模式的探究

占筮：中国人思考模式之 源	141
“天”“人”大搏斗	145

两种奇特的思考原则154

传统思考模式的现代评价 ...159

传统心态的诊治

清除“依附心理”163

摒弃“保守心态”174

后 记

引言：蓦然回首

在进入本书正文之前，有必要明了我国学术界80年代最重要的新发展——“文化讨论热”，其声势之浩大、参与者之众多、所持观点之繁杂，都足以给20世纪末叶乃至21世纪的中国烙上永恒的印迹，并将从某种程度上支配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道路。

一个热点的兴起

80年代悄然兴起的文化讨论，迅速发展成我国众多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瞩目的课题，这一过程可回溯到1981年10月11日。那一天，撰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史》巨著中国部分的学者召开了一次讨论会，率先

提出古代中国文化如何现代化的问题。这之后，1982年6月和12月，在上海召开了两次“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与会者就文化与文明、文化史的对象和范围、文化形态诸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估、中国文化的交流、文化中心、文化的研究方法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上尤为重要提出了研究中国文化的紧迫性。1983年3月和11月，香港中文大学召开了两次“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大陆、台湾、香港、美国、日本、新加坡等的一些著名学者参加了会议，并就现代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传统文化的延续、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化问题和中国家庭及其变迁等进行了热烈讨论。1984年，中华书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在郑州联合召开了“中国近代文化研究学术讨论会”，准备编辑一套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丛书。同年12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发起组织了全国首届“东西文化比较研究讨论会”，围绕着以下课题进行了热烈讨论：进行东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意义；关于文化及东西文化的概念；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及其与西方文化的差异；关于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方法；东西文化的不同原则等等。上海还以《中国文化史研究集刊》为中心，集中了大批专家和学者的力量，发表了很多高水平的研究论文。

1985年3月和1986年1月，中国文化书院在北京先后举办了“中国文化讲习班”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班”，著名学者如梁漱溟、冯友兰、侯仁之、金克木、

任继愈、李泽厚、庞朴到会做专题报告，讲习班还邀请美国的杜维明、陈鼓应、成中英、邹说、魏斐德等教授和来自德国、澳大利亚、香港的学者讲学，全国各地千余名青年云集首都听讲，造成了很大的声势和影响。这之后，各种有关文化、文化史、中西文化比较研讨班、讨论会相继在北京、上海、武汉、杭州、青岛等地举行；一大批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在各类理论刊物上发表；多种有关文化的丛书编辑出版，有些地方已形成了老专家和中青年学者组成的研究文化问题的理论群体。中国文化书院开办的“中西比较文化研究班”在全国的学员达万余名。这一切都汇集成了所谓“文化热”。

这次文化讨论，从它的规模、内涵、影响来看，较之中国百余年来出现的几次文化讨论，尤其是“五四”时期的文化大论战，确有自己的鲜明的特色。有些学者认为，讨论中所提的问题、观点、民众的普遍情绪与“五四”时的情况有惊人的相似处，有些学者的看法甚至还达不到当时的水平。但历史毕竟流逝了整整70年，80年代的“文化热”是在世界浪潮的冲击下，由我国自身的社会现实孕育而出的，它反映了中国人当代生活的企盼，其特点有五：

其一，今天的文化讨论具有社会性。与“五四”时期文化论战不同，这次“文化热”不单单由少数知识精英坐在书房里的“夫子论道”，而是老专家与中青年学者携手、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并进。社会各阶层人士都对文化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电视系

列片《河殇》引起的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反响就是明证。

其二，讨论内容的广泛性。这次文化讨论的触角已深入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诸如文化与政治、文化和经济、文化与科学、文化和教育等等，还涉及到社区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旅游文化、饮食文化、环境文化等等。所以，这次文化讨论突破了以往文化论战只限于历史文化领域的状况，突破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人为分野，把人的思想观念、社会心理、思维模式、伦理道德、审美情趣、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生活方式等都摄入了研究的视野。

其三，文化讨论的世界性。众多的思考者自觉地把中国文化置于世界背景之下，提出了许多前人未能意识到的问题，开拓出更广更深的理论领域。1986年1月，上海复旦大学召开了国际中国文化首届讨论会，除国内一批学者到会外，美国学者魏斐德、成中英、杜维明，加拿大学者秦家懿，联邦德国学者庞纬、傅敏怡，日本学者大庭修和苏联学者齐赫文斯基院士等参加了讨论会。会上，学者们就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价、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相互关系展开了热烈讨论。这是一次中外学者共商、理论与实际工作者同谈的学术盛会，它标志着讨论中人们文化视野的拓展和文化研究的深入。此后，“中外文化的交融和冲突”，“中西文化的特质”等比较文化的重大课题成了人们青睐的对象，不断有高论、新

论面世，而比较哲学、比较宗教、比较文学、比较艺术、比较政治、比较法律、比较思维等等更是成了学术界的热门话题。

其四，文化讨论的宏观性。80年代的“文化热”突破了旧文化研讨的时空构架，从把握中国文化发展总趋势的历史维度发展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评估的空间维度；从囿于汉民族的文化传统到放眼于各族文化的发展、融合、渗透和汇通；从静态的文化描述到动态的历史把握；从单一方法的研究到多元方法的综合探讨等等。

其五，文化讨论的现实性。这次文化讨论中，许多学者都有强烈的现实感和紧迫感，立足于80年代中国改革的现实，试图解决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现代化的问题，积极探索中国文化发展举步维艰的深层原因，并对近代科学为什么没能在中国产生等问题显示出浓厚兴趣。

就国内文化研究的现状来看，对文化的探讨实际上已经形成三个层次：一是对文化本身的研究，如文化的概念、文化发展的规律、文化的一般特征等等；二是对文化史的追溯，如研究中国文化发展史、世界文化发展史，以及文化的国别史或断代史等等；三是从文化比较学的角度探讨中西文化的异同，如中西文化的特质、中西文化的优劣，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影响等等。

面对“文化热”，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会在我国这个特定国家和80年代的特定时间，出现这样的

大讨论，其原因和背景何在呢？

环球注视着中国

它直接导因于我国目前所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回顾中国近40年来的历史，“左”倾思想曾长期弥漫一切，整个社会似乎只有一个“脑袋”在思考、一个“主义”在指导、一个“思想”来统治、一个“规律”来支配。因此，科学发展的人文背景、现代社会建立的文化氛围或视而不见，或斥之为虚妄，甚至干脆当做“反动”学说，必须“批倒批臭”。但是，世界现代化历程证明，文化虽不直接产生现代工业、农业和其他经济部门，但建立于文化背景之上的科学、人的素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都直接决定了某一社会发展的程度。30多年的闭关锁国拉开了中国与西方本已存在的距离，如果说19世纪时的中西差距可以用步行速度缩短的话，那么，进入20世纪中叶以后，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中西差距就非得用火箭般的速度才能缩短了。当“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对未来”的口号重新支配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运行时，当封闭已久的国门重新开启时，面对西方国家的“无人工厂”、“车轮子上的国家”、“电脑家庭”、“月球车”等等，中国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深切地感受到“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

年”！

于是，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在历经种种痛苦的曲折之后终于在70年代末开始了建设现代化的宏伟事业。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西方文化再次与中国文化发生猛烈碰撞，随着对内搞活方针的贯彻，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但是，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人们不仅仅感受到科学技术落后、物力财力匮乏给我们的发展所带来的痛苦，更使人们深刻地感受到许多人思想观念的落后、思维方式的陈旧，以及心理定势的古老而给予现代化建设的沉重负担。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某种科学技术、管理体制乃至哲学、经济、法律等理论在西方是一种样子，把它们移植到中国又呈现出另一种状态，事物本身并没有变，为什么却有相差甚大的效应？为什么解放30多年，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腐朽的封建思想、观念和意识仍有如此强的生命力，以至最终酿成“十年浩劫”？为什么人人都盼望我们的祖国早日富强，人民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而现实又往往与这种愿望有一定的距离？等等。为了解答这些长期叩击心灵的问题，人们找到了“文化”这把钥匙。因为，所谓现代化决不仅仅是经济的、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如果把现代化仅仅视做彩电加冰箱，电脑控制生产，牛仔裤加迪斯科，那就大错特错了。当今世界上许多致力于现代化的国家经过长期的摸索和挫折，都逐渐看到了人的心态和精神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性，都把目

光从客体(机器设备)转向主体(掌握这些机器的人);从表层现象(人的生产能力)深入到内在的东西(人的心理、观念和精神)。所以,现代化实际上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里程碑,它不仅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的现代化,同时也包括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结构的现代化。简言之,所谓现代化,是一个包括生产、社会和人的思维方式、观念体系和心理状态的全面高度发展的状态,在实质上仍是一个文化的现代化问题。

文化的概念历来就有诸多争论,按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它有广义和狭义的双重内涵。从狭义方面来说,文化是指社会意识形态,如哲学、宗教、艺术、道德、法律等等,是观念形态的东西;从广义方面来说,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我们说现代化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是就后者来说的。从这一角度来看,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至少要在三个层面上达到现代化:

一是物的方面。主要包括先进的科学技术装备,现代化的生产条件,以及丰富充足的生活资料等等;

二是组织制度的方面。主要指现代化的生产管理手段和机构、先进的国家行政机关,特别是高度发达的法律体系等等,这是一种物化了的意识或观念;

第三个层次是更重要的方面,即人的观念、意识和心理的现代化。

我们只有从广义的文化去理解现代化，并考虑到现代化的三个层面，才可能深刻地挖掘出西方的科学、技术乃至理性和艺术在中国为什么会变形变质的原因，才能清楚地洞察到封建意识通过人的观念、习俗、心理状态等长期延续的深层缘故，也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发展迟缓的人文背景。所以，我国80年代文化研讨热兴起的深刻原因就在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现代化问题，亦即立足于中华民族本世纪末的新腾飞——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基点上，如何重估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以建构一个现代中国新文化。具体而论，正因为我们建设的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国家，所以要反省中国传统文化；正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赶超世界一流国家的发展水平，所以要探讨西方文化；正因为我们是处于20世纪的时间维度和站在拥有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的空间维度谋求发展，所以要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而上述问题的真正解决，又迫切需要文化学的理论，所以，近年来对文化学本身的探讨已使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浓厚兴趣。

中国80年代文化讨论兴起的背景还在于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所谓“中国热”，这不仅表现在西方与中国通商，外国在中国投资，更表现于西方人对中国灿烂的古代文明的向往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探讨中。美国、日本、法国、德国、荷兰、英国等都形成了一批研究中国的中心，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论文、专著也大量涌现，似乎已形成研究中国传统

文化的高潮。其实，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早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西方就产生过，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的罪恶、鲜血和毁灭使许多西方学者产生了欧洲文化危机感，他们失望之余，便把眼光从西方转向东方。同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曾经做过的那样，他们希图在中国的哲学、文学和戏剧艺术中寻找出路。如德国的一些学者，象著名文学家、剧作家布莱希特等人不仅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的文明，而且写了许多以中国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在当今世界，许多对西方社会和文化抱有深沉责任感的忧患之士，象物理学家薛定谔、历史学家汤因比、哲学家罗素、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等都对中国传统文化倾注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发表了许多赞美之词。在20世纪，西方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丰富充裕的物质生活条件，何以又会出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呢？这有两个重要原因：

一是现代西方出现了蔓延整个社会的两大意识，即所谓全球意识和寻根意识。随着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人类交往空前便捷，世界仿佛越来越小，成了“地球村”，世界的政治经济也正在向一体化方向发展，区域性的军事、政治、经济组织活动的价值越来越大，人们普遍认识到：纯粹的国家问题越来越少，国家问题往往就是国际问题；纯粹的个人问题也越少，个人问题同时就是社会问题。因此现代人的意识日益向立体的、有机的和全球的方向发展。在全球意识产生的同时，又出现了一种寻根意

识，即芸芸众生都渴望寻找自己家族的和民族的传统，希望解决“我是谁？”“我是什么？”“我能做什么？”“我到底做了什么？”特别是应该如何确立自我在世界、人类或群体中的地位等等一系列人的自我认同的问题。

全球意识和寻根意识似乎是矛盾的：前者的致思方向是全球的、人类的；后者的致思方向是民族的、个人的。但实质上两者有统一的方面，这就是渴望在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找到能解决全球问题的方法和手段；从个人的自我认同中确立自身在人类中所占有的地位。正是为了从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寻找解决人类、全球问题的答案，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有几千年发展史的高度文明的体系，自然就越来越引起世人的瞩目了。

在上述背景下，西方人开始深刻反省近代以来弥漫整个思想领域的“欧洲中心论”，开始了解到至少在二百年前，欧洲文明并无任何超越中国文明的地方，文化的多源论替代了文化的一源论，对欧洲之外各种文明产生、发展的高度重视成为崭新的学术思潮。跨入20世纪后，在50年内，连续发生两次世界大战，一片血腥唤醒了素以人道主义自居的欧洲人的良知，人们更深刻地感受到精神的全面危机，不禁扪心自问：当年古希腊人、古罗马人的悲剧性命运是否正降临现代欧洲？尼采高声呼喊的“上帝死了”已预示着基督教文明的衰落；弗洛伊德对人潜意识令人毛骨悚然的深刻揭示动摇着自文艺复兴以

来人们对人的完美性的崇拜；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黑暗的批判引起人们的种种疑虑；罗马俱乐部对世界未来的悲观预测更使人不寒而栗。这一切都汇集成当代西方人强烈的危机意识。正是从这种危机感出发，才萌发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和赞美。

全球“中国热”产生的第二个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60、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空前的变化。在世界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与欧美的资本主义模式，东欧、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并列的所谓东亚工业的模式（主要指日本、南朝鲜、新加坡、台湾、香港）。有些学者认为，东亚工业区域在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等各方面都与欧美、苏联和东欧有很大不同，即使它们之间也有诸多差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东亚工业区域都处在中国古代儒学文明的辐射圈内，是一种代表儒学精神的工业文明。

上述两种情况都使当代西方学者重新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和估价。1983年8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举行的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专门组织了两个讨论会，其一的主题是“东方哲学”；其二主题是“中国哲学在现代世界中的挑战”。英国当代史学家汤因比说：“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度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营垒，最需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又说：“中国如果不能取代西方成